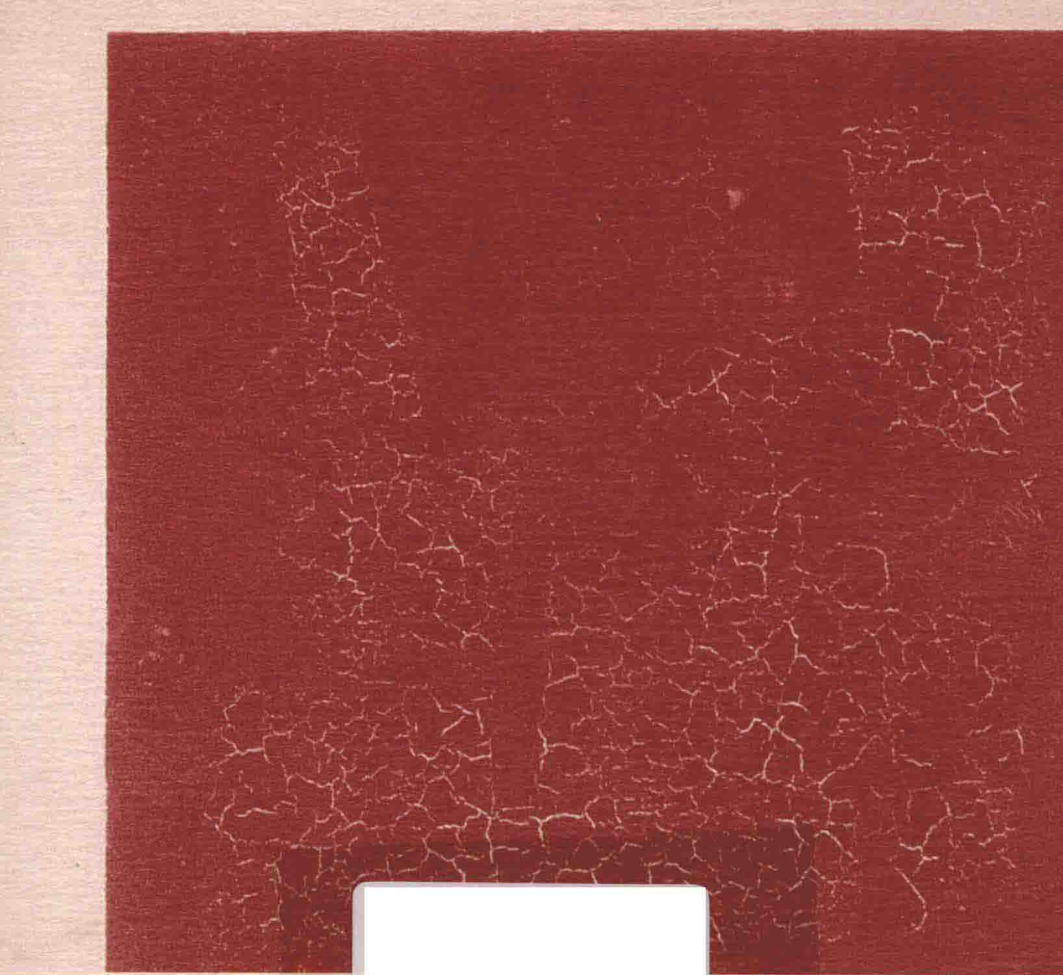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美] 马克·波斯特 著 张金鹏 译 夏凡 审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美] 马克·波斯特 著 张金鹏 译 夏凡 审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
(美)波斯特著；张金鹏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2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ISBN 978-7-305-15544-4

I. ①福… II. ①波… ②张… III. ①福柯, M. (1926~
1984)—社会哲学—思想评论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226 号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by
Mark Poster

Copyright © 1984 by Mark Pos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18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著 者 [美]马克·波斯特

译 者 张金鹏

审 订 夏 凡

责任编辑 李乾坤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1 字数 156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544-4

定 价 3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前言与致谢

本书原为考察米歇尔·福柯论社会理论与社会史的最新著作的价值的一组论文。福柯自 1968 年以来写作的著作(《规训与惩罚》、《性史》和大量短篇)包含着某些社会理论和社会史著述中的重要进展。我的目的是从我所发现的具有较小价值的其他福柯思想的特征中析出那些进展。我并不想评价作为整体的福柯著作,而只是关注并分析它的某些特定特征。

为此,我将福柯的著作置于双重问题式中:社会批判理论的以及称之为“信息方式”的新社会构型的问题式。尽管福柯的政治学是模糊的,他的著作则非常适合于批判理论。我会证明,他提供了包括理论因素的分析模式,如果对这些理论因素进行适当的解释,就能为批判理论开启新方向,并将之带出它当前的困境。但只有认识到发达工业社会的某种重要变化,这些新的方向才会变得明显。为此我创造了一个多少有些瑕疵的短语“信息方式”来表征这些变化,并将当前的情势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进行对照。

“信息方式”这一术语指的是 20 世纪绝大部分由电子和相关技术所带来的新的语言经验。这不是一篇关于信息方式的文章,我不打算将这个术语发挥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尽管如此,我发现,只要我能说明我在福柯的著作中所发现的理论进展并将之与建立在生产方式概念基础上的传统批判理论进行对照,那么发展这一术语就是必要的。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打算提出信息方式的一般理论。

开头两章我试图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来考察福柯最近的著作。其余各章考察前两章中的理论发展与《规训与惩罚》和《性史》这两个历史学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的重点在于福柯的著作对于新社会史的写作的效用。

我的研究得到了学院和学会的帮助。来自于国家人文科学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1981—1982年的一笔奖学金在推进我工作中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我还收到来自于加州大学厄湾校区的人文学院的夏季学院奖学金，以及加州大学厄湾校区批判理论重点研究项目的资助。朋友和同事们给予了批评和鼓励，尤其是乔纳森·维也纳(Jonathan Wiener)、大卫·卡罗尔(David Carroll)和弗兰克·伦特里基亚(Frank Lentricchia)。政治出版社的编辑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并提出了有帮助的建议。

有三章的较早版本发表于以下杂志：第三章在《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第49卷第1期；第二章和第五章分别在《社会人文科学》(*Humanities in Society*)第5卷第3和第4期以及第2卷第2期。它们允许这些文章的稍后版本出现在这里，我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22 采取整体的视角,将部分与整体联系起来看。每个人都将生活的行为总体化,而认识者也同样如此。萨特坚信人类的主体性是将某个领域总体化的能动性,而这是理论家进行总体化的基础。不是说理论家能自动获得总体性,而是说:理论家之所以进行总体化,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意识都是自由的,因此总体性是这一承诺的可能基础。无论是作为将领域中的孤立方面联系起来的认知者,还是作为选择若干可能的路径来兑现承诺的自觉行动者,人类主体都在进行总体化。相应地,理论家的职责和任务是在知识领域内实现总体化。理论家的总体化不是上帝的或笛卡尔的完美的、必然的、客观的知识,因为理论家处于特定的历史领域中,并拥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理论家的总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但那些愿意采纳它的人也能获得它。就这样,辩证理性既是主观的,受到理论家处境的限制,又是客观的,是每个人都可能得到的计划。

有了源自存在主义的这个总体化范畴,萨特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科学主义的牺牲品,不再用客观主义的语言表述问题。与此同时,总体化的辩证法取代了生产方式理论中固有的还原论的处理步骤。辩证法的每一个要素都保持了它的相对自主性;例如,家庭中的统治形式不再还原为工作场所中的统治形式。尽管如此,每一个中介都保留着与总体化的关系,但这里的总体化不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相反,它意味着被统治阶级采纳了总体性目标,自由主体创造出一个没有阶级和统治的世界。这些主体将通过他们对自由社会的承诺而认识到他们的自由,并通过创造那一历史的实践把自己变成这些自由主体。

23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某个时候,福柯认为萨特的图式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萨特犯下的最根本的罪是在意识哲学的基础上构建知识。所有哲学家立场的幻想都被萨特以令人尴尬的坦诚重演了一遍。福柯认为,没有哪一个哲学家-理论家能够将他自己创造的思想表述作为知识的标准。既然萨特没能用存在主义的救生艇拯救马克思主义,那么

就必将淹死濒临绝境的受害者：批判理论。用存在主义的荒谬的主体性替换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必然性，这并不是批判理论复兴的基础。

然而福柯忽视了萨特思想中的某些因素，而这些因素与福柯想要批判理论前进的方向是一致的。福柯的著作致力于发展出一种不过多诉诸理性的知识形式，不会被尼采批判为“哲学家的权力意志”的知识形式。萨特的辩证理性在某些方面符合这些限制。萨特没有断言辩证理性会导致客观知识；他也没有声称理论家发展了总体性的确定知识。萨特坚持认为理论家和其他人一样是受处境制约的，他自己的知识受制于由每个人的历史和社会地位所提供的视角——尼采如是说。我们将看到，福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撰写他的论监狱和性经验的著作时，坚信他的计划在现代是牢不可破的。

即使有这些可能的一致之处，萨特和福柯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尤其是关于总体化的问题。福柯非常重视限制理论家认识论观点的范围，所以他从根本上拒绝系统阐述他的立场，甚至不太愿意仔细推敲概念。他拒绝探究他自己从何种立场获得知识，有时为了避免自我反思的任务，甚至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萨特则处于另一个极端：他发现马克思主义非常需要认识论说明，于是将批判理论的整个大厦都建立在认知行为的基础之上。因为意识是自由的（或未决定的），个体将他自己的谋划总体化，于是整个认识的努力都还原为个体选择行动路线的需要。对总体化的复杂阐述被还原为理论家自我选择的认识论要素。哪怕批判理论对历史因素的分析天花乱坠，它充其量只是理论家的个体言说。

24

萨特的观点中有一种思想上的诚实，这是福柯不能忽视的。理论家的立场对于他发展出的理论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知识被说成不是来自某人或某地的东西，无论是否对知识的有效性做出谦虚的陈述，文本中都会掺杂些许欺诈，这种欺诈让文本自以为具有某些客观的权威——这不是福柯打算要的东西。最后，与福柯从文本撤退到无反思的谦虚相比，萨特对知识的个人性质的坚持更具有尼采主义的风格，更

为警惕知识以其他方式成为权力形式的危险。福柯警告人们不要把他的文本当作警察的卷宗,但这一有益的忠告变成了其隐藏在认识论暗箱中的借口。

25 福柯的逃避也是情有可原的:在萨特那里,自我反思的迫切要求最终成了对理论家的合法化。萨特从界定他的意识的小小要求开始,以一个夸夸其谈的密闭体系告终,这个体系要求全世界的被压迫者效忠于它。萨特对他的处境的总体化导致了一个理论化的庞然大物,就像一个暴君那样站在大众面前,颐指气使。萨特开始想要通过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以努力缩小理性的范围,最终却使知识分子的权力惊人膨胀。萨特的辩证理性预先排除了抗议运动的原创性,强迫它服从理论,葬送了自由的实践。批判理论的认识论要求在福柯的沉默和萨特的直率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既承认理论家的处境,从而尊重理性的界限,又不在文本中隐藏作者的反思性在场。

萨特与福柯更为尖锐的分歧是在理论对象的问题上,而且双方的理由也都很充分。对于萨特,社会历史领域是由人与物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虽然萨特也关注了物的世界的转变(生产方式),但他的主要关切是人类主体世界(群列、群体融合)以及他性通过物的中介闯入主体性(异化)。萨特的主要问题是主体性:在历史持续不断的总体化中,人类何以能够认识并实现他们的自由?《辩证理性批判》的重点是主体在努力获得自我认识时所遭遇到的障碍。换言之,萨特的焦点是抵抗统治的条件,这一焦点无疑来自他在二战期间参与抵抗运动的经历,并与日益繁荣的发达工业社会(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法国)的情况相符,在后一情形中,没有发生气候的反抗运动。

26 福柯的理论对象看似与萨特的完全不同,但却可以理解为批判理论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在结构主义者抨击了主体之后,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述偏爱把客观性作为考察的领域。他试图理解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注意到的统治方式或“权力技术”。权力技术——诸如全景监狱或规训体制——由话语与实践聚合而成,周密部署对肉体和精神

的控制。这一可理解层次不能通过指涉主体或意识形式来达到,而要通过对客观性领域的仔细分析。在这一点上福柯与萨特针锋相对,对福柯来说,抵抗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主体性模式不是重要问题,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对统治的反抗是始终存在的。^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1968 年 5 月的冲击力被为数众多的抵抗形式所继承,这些抵抗似乎存在于社会领域的所有权力点上,这与萨特笔下的情况显著不同。然而,注意到政治局势并不意味着把区分两位思想家的重要理论问题搁置在一边。尽管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们对抵抗的关注与对统治的分析是互补的,而不必然是对立的。

萨特与福柯真正对立的问题不是研究领域,而是主体的地位。福柯怀疑那种把中心主体作为可理解性源泉的立场。将个体的自我意识排除在知识的对象之外,这是福柯 20 世纪 70 年代的计划的核心理要。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只是研究了研究对象——权力技术,将个体或群体的理性或行动者放在了一边。他寻找个体自我意识之外的话语/实践的机制。在《性史》中他进一步界定了他的对象:将个体构建为真理主体的话语/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个体不是被看作需要捍卫(或驳斥)的命题,而是社会历史过程的结果;不是历史的有意识的目标和潜在基础,而是历史的虚幻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制度中,即以(1) 理性人类本质的假设以及(2) 内嵌于权力关系中的科学规训的散播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中,批判理论的任务——对于福柯来说——是表明主体与规训是如何在真理的招牌下被构建起来的。在这一语境中,理性主体不可能被认作是起源或原因。

27

经常被人遗忘的是,萨特是以一个几乎贯穿毕生的策略开始其职业生涯的。萨特,被结构主义者看作是主体的主要捍卫者,早在 1939

^① In an interview entitled “Powers and Strategies”, he affirmed, “……不存在无抵抗的权力关系……” Trans. in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 , p. 142.

年就认定自己是所有精神哲学的反对者。^① 萨特用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前提来反对法国学术界的唯心主义——理性主体是其形而上学的中心。相反，这个现象学家把意识设定为一种关系，一种流注于事物之中的匮乏；同时这个存在主义者将人类现实描述为飘散于世界中，是不以理性为中心的存生。萨特的主要著作《存在与虚无》(1943)和《辩证理性批判》(1960)继续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

然而，萨特确实为主体设定了一个中心，不是理性的中心，而是意义的中心。意识创造意义，它生产意义，哪怕与他者一道迷失在世界中。根据某些理论家的看法，这一主体观对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像福柯这样的思想家来说，萨特立场的问题是，萨特用本体论的方式，而非语言-社会学的方式对生产意义的主体进行理论说明。例如，克里斯蒂娃(Kristeva)之所以称赞胡塞尔，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已经注意到这一建构客体的主体性，它在意谓行为中生产了位置意识”，而不是因为他“对作为意义起源的‘存在’或‘在场’的形而上学断言”。^② 在萨特那里，《辩证理性批判》确实努力超越《存在与虚无》中的“生产意义的主体”的本体论陈述。在这里，萨特用社会的和历史的范畴标明了主体性模式的转变，但没有脱离本体论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萨特与福柯处理的问题相同，方向也一致，只是在超越理性主体方面走得没有福柯那么远。福柯本人也仍然没有完全在主体性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他还不能对主体的意义生产做出理论说明，也不能解释对统治的抵抗。

28

① “Une Idée fondamental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l'intentionnalité”, *Situations I*, (Paris: Gallimard, 1975, original edition 1947), pp. 38-42.

② 引自 Rosalind Coward and John Ellis, *Language and Materialism: Developments in Semiology and the Theory of the Subjec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p. 132.

语言理论

如果现象学存在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来消除传统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一种方法论,那么语言学就是另一种。巴特(Barthes)在他的著作《神话学》(*Mythologies*)一书中证明了结构语言学分析日常生活语言的能力。他揭露了在广告、时尚和无数休闲活动中起作用意识形态机制。当日常生活被看作是语言学意义(符号学)的领域,就发现了被赋予普遍性外表的社会制度被自然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冲突被隐藏在了漂浮的能指面具背后。巴特认为,符号学阐明了日常生活的意义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中的统治机制。

将符号学阐述为一种完备的批判理论的工作是由让·鲍德里亚完成的。鲍德里亚继续了巴特还有列斐伏尔的工作,发展出一种表意方式的历史转型理论。^① 仅仅展示出当今消费社会的语言学机制是不够的。除非语言形式的形态学得到了分析,否则一定的语言结构自身似乎是普遍的,这一立场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背道而驰。本着这一精神,鲍德里亚分析了当代符号学机制的历史起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能指(词)与所指(意义)和指涉(事物)相分离,正如其他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说的那样。但这一语言范式是一种历史现象,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那之前,语言被象征(symbols)的使用赋予特征,其中所有的语言要素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离散的。鲍德里亚特别凭借人类学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

29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导语言形式不是象征(symbol)而是符号(signal)。既然语言学要素变成了碎片,能指似乎就能够“漂浮”在社

^①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rans. Charles Levin (St. Louis: Telos Press, 1981, original edition 1972).

会实践的空间中,并任意地与所指和指涉相结合。实际上,生产过程已经被这些漂浮能指所改变。资本家们售卖他们的产品不再依赖于“使用价值”——商品的想象的或真实的有用性。相反,在广告过程中,能指似乎是随意地附着在商品上。人们想要的那些品质(性感、自信心)被赋予了商品,与它们的功能或实际效用无关。因此剃须膏保证你对异性的吸引力,除臭剂保证你自信满满,汽车是积极的社交工具,软饮料是集体、爱情和受欢迎的关键,凡此种种。这个过程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表意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

能指借以附着于商品的符号机制确保了信息接受者的一种即刻的似乎是无意识的反应。广告传播是以电子回路为媒介的。广告商通过仔细操控讯息的结构来建构主体,这一结构以意义的直接接受(即排除了理性的接受)为预期目标。符号使得批判思维短路;消费者不能仔细权衡商品的可能功用(能指是否与指涉相符?),而是立即认可了信息,并采取冲动的符号学消费行为,满怀希望地购买了产品。鲍德里亚断言,所有符号的整体构建了符码,主体被嵌入符码之中,无处逃逸。一开始,鲍德里亚认为他的符号学批判是对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补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分离,为符码创造了条件。到了一定程度,资本积累的过程必然会创造一个消费社会。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资本主义的增长就会要求形成新的需要,为达成此目的,就要求助于符号。工人阶级的新需要是情感上的和社会的,所以资本家用同样产品来提供爱和社交,而这些产品原来只是更快捷的交通工具和更有营养。广告符号学揭示了资本主义辩证法的新阶段。

几乎就在形成这一立场的同时,鲍德里亚就对其还原论的理论基础感到不满。表意方式并非跟生产方式如影随形。他很快就强调表意方式的相对自主性,而后是它的完全自主性。^①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致

^①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 Mark Poster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5, original edition 1973).

力于生产主义的社会模式,而批判符号学的含义导向一种交换主义的(exchangist)立场。正如莫斯(Mauss)和萨林斯(Sahlins)等人类学家表明的那样,意义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而非生产过程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受制于功利主义/功能主义的社会观,它将前资本主义的构型贬低为一种生存境况(subsistence position)。只有资本主义才解决了剩余之谜,不断将剩余价值再投入生产以刺激增长。但是,鲍德里亚反驳说,非资本主义社会也生产剩余,区别在于它们对剩余产品的处理(在赠送或礼物交换中)不是决定于某种功利主义的理性,而是决定于意义交换的过程。通过对符码的充分分析,鲍德里亚的结论是:表意方式与生产方式必须在理论上分道扬镳。

31

鲍德里亚的著作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所遭遇的困难,这倒与福柯的观点有些相似。他们都力图在批判理论中给予语言以足够的重视,都尽力描述与历史社会活动相关的语言经验。鲍德里亚对福柯的论战性著作《忘掉福柯》(*Oublier Foucault*) (1977)关闭了双方的对话之门。然而他们都关心语言实践中的主体建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共同点。鲍德里亚本人没有直接沿用他的早期立场,而是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从《象征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1976)开始,这条道路使得他远离了批判理论的关注。

另一个发生了“语言学转向”^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于尔根·哈贝马斯,他是法兰克福学派在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去世之后的主将。哈贝马斯用劳动、交往和语言的解析学划分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的关注。^②一旦哈贝马斯抛弃了基础/上层建筑的还原论模式,

① Martin Jay, “Should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e a Linguistic Turn?: Reflections on the Habermas-Gadamer Debate”, in D. LaCapra and S.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86-110.

②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original edition 1968).

他就从语言方面研究了批判理论的基础。他认为日常语言本身就内含了一种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的真理标准。^① 这一真理标准不是位于语言的语法或句法层面，而是位于哈贝马斯所谓的语用层面——在这一层面，语言是一种交往行为。与符号学家巴特和鲍德里亚不同，哈贝马斯对作为符码的、具有内在逻辑的语言不感兴趣。相反，他使批判理论更接近语言与行动的交叉点。“交往互动”是他的研究领域。虽然这一战略对批判理论肯定是有启发的，但哈贝马斯却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优势。有成果的研究线索要着眼于言谈情景的变化，尤其是由最近的电子技术所带来的那些变化。可惜的是，哈贝马斯只对“理想言谈情景”感兴趣，认为它构成自律的理性个体的基础。

尽管哈贝马斯和福柯经常被看成是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经常安排他们之间的辩论，以期促进理论工作的发展，然而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哈贝马斯沉迷于理性基础上的个体自治这一启蒙运动的价值，而福柯则质疑理性与民主的关系。再者，哈贝马斯求助于先验的理论基础，例如理想的言谈情景，而福柯遵循更严格的历史方法，追溯不同的话语/实践模式的起源而不偏爱其中的任何一种。哈贝马斯在理论上更为系统，在政治上更具乌托邦色彩，而福柯怀疑体系，并对未来消除统治的前景保持沉默。总之，他们之间共同点乏善可陈，而哈贝马斯的观点越来越像是从批判理论退回到康德。

精神分析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兴努力相关的第三个重要方法论是精神分析。自从威廉·赖希试图综合历史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以来，弗洛伊德观念一直颇受批判理论家们的青睐。尽管赖希与法兰克福学派

^① *Communic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少有往来,但霍克海默还是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很感兴趣,并组织了一个研究计划,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权威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这样重量级人物参与其中。自从《权威与家庭研究》(*Studies on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于1935年出版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调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问题上。在这一方面,有阿多诺论社会心理学的文章,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55)和《五篇演讲。精神分析、政治与乌托邦》(1970)以及哈贝马斯的《知识与人类兴趣》(1971)。

除了哈贝马斯关注的是治疗经验的认识论价值,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的成员研究的主题是相同的,尽管有着重点上的重要差别。他们都赞赏精神分析为理解个体和社会提供了中介。他们声称,弗洛伊德的范畴使人们理解了上层建筑(意识、意识形态和性经验)的重要意义。精神分析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所不能解释的历史的退化现象,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其最好的例证,但文化工业所引发的幼稚渴望同样如此。^①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所使用的精神分析的核心主题是性压抑的观点。马尔库塞等人用弗洛伊德式的布尔乔亚力比多经济学批判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批判。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范畴翻译成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于是现实原则变成了操作原则,而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相似的是弗洛伊德的剩余压抑。运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将精神分析的批判价值加诸历史唯物主义,却没有对任何一个立场提出内在的批判。尽管有很多重要的文章产生于这一理论方向,但却没有进行对任何一个立场的重新评估,也没有重新规定社会批判理论所需要的东西。

在福柯的著述中,精神分析以完全不同的语域呈现出来。对于福柯来说,与他在论性经验的历史学论文中使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反,现

^① 例如,见 Theodor Adorno, "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 in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Urizen, 1978), pp. 270 - 299.

- 34 在精神分析就是那一历史的一部分。他更是批判了与法兰克福学派和赖希有关的性压抑假设。基于他的话语理论,福柯坚持认为资产阶级文化并不压抑性经验,而是通过性话语的散布(包括精神分析在内)创造出各种性的实践形式。主体被塑造成这样一种人,仿佛性经验就是他或她的真理,是最终构成其核心的自我的奥秘。此外,精神分析在福柯的性经验史中扮演的这种话语/实践机制的角色,与宗教忏悔的权力关系颇为类似,客户/主体在治疗情景的话语中被一再建构。福柯否认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任何敌意,然而他在《性史》中允诺要对这一人文科学进行颠覆性批判:虽然它宣称把人从压抑中解放出来,但却实践和扮演了一种统治模式。在法国,对弗洛伊德的欣赏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①,威廉·赖希观点的重要性,让-弗朗索瓦·利奥塔^②等思想家,以及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著作相关的一种奇特的精神分析学说(它掺杂着黑格尔的现象学与语言学结构主义)激发了这一兴趣。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拉康的重要性在于他对阿尔都塞、鲍德里亚和德鲁兹/瓜塔里的影响。在拉康的复杂而又晦涩的公式中,主体是在以语言为中介的过程中被无意识地构建起来的,该过程将主体固定在去中心化的自我误认中。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1972)中,德鲁兹/瓜塔里扩展并颠倒了拉康的观点,提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详尽批判。和福柯一样(这也许是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联合的基础),德鲁兹将精神分析置于他的批判领域之中,将之解释为力比多的
- 35 “领地化”(territorialization)或“编码”的一种形式。俄狄浦斯情结根本没有提供一种理解心理构型的方式,反而是引诱并同时压制儿童性行为的父名工具(parental vehicle)。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力比多的自然流变被家庭编码,而在早先的社会构型中它直接被政治所统辖。德鲁兹/瓜塔里的目的是“去领域化”力比多,解放其精神分裂的流变。尽管福

① Sherry Turkle, *Psychoanalytic Politics: Freud's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 157.

② 例如, *Dérive à partir de Marx et Freud* (Paris: 10/18, 1973).